

国难与国庆: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“双十节”的纪念与阐释^{*}

周游

(华东师范大学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,上海市 200241)

摘要: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“双十节”纪念,在延续战前凸显“党国”符号的同时,也有一些新变化。在纪念活动中,国民政府不仅对内凸显救亡意象,彰显民族主义,进行凝聚民心、调动民力的动员,对外也与盟国共庆,将“双十节”的民族主义意象与“以建大同”的世界主义意象融为一体。在“双十”叙事中,国民政府延续战前纪念中对辛亥革命领袖及国民党先烈的颂扬,并将“辛亥精神”发展为“抗战精神”。另一方面,国民政府也借继续神话孙中山,和凸显其“革命尚未成功”说,将孙—蒋连接,推行出孙中山正统继承人蒋介石独揽大权的合法性。

关键词:双十节;抗战时期;国民政府;国庆;辛亥革命

中图分类号:K26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3-9841(2015)02-0175-07

国庆节是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政治符号,意识形态的变化,在节庆的活动和诠释中常常会有及时的反映。民国时期的“双十节”纪念就是如此。民国初年,“共和”肇建,北京政府以“共和”诠释“双十节”,表面是对人民民主、民族和解的高扬,实际上却意在彰显袁世凯势力在各种政治力量中的核心地位。当袁的核心地位受到质疑,国民党等先后与之分道扬镳,“共和”便日益徒有其名,北京政府的纪念也日渐形式化和趋于萎靡。而国民党方面,则始终将“双十节”界定为彰显本党功勋的“革命”节日,虽曾一度认同北京政府的“共和”解释,却貌合神离。“宋案”发生,国民党发起“二次革命”,“革命”更成为国民党的核心价值。后来国民党在南方建立革命政权,“双十节”的意义更由一般性的“革命”,发展到与党的系谱相联系的强势符号^[1]。

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,为了“训政”的需要,“双十节”纪念趋于“党国”化,原先纪念中叙述革命先烈的历史,逐渐被国民党的建国历史代替,“党”与“国”紧密结合在一起。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后,“双十节”纪念中开始出现救亡的元素^[2]。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,由于国难日益加重,国民政府不得不面对民族救亡问题,在“双十”纪念中,救亡意象也日益凸显,并随国内外形势演化而出现新的变化。

一、“双十节”纪念活动中救亡的凸显

抗战爆发后,国民政府在“双十节”纪念活动中,仍延续战前凸显“党国”符号的内容。如在抗战初年,南京市党部及抗敌后援会组织的各界“双十”纪念会上,就有“三民主义万岁”、“中国国民党万

^{*} 收稿日期:2014-05-10

作者简介:周游,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,博士研究生。

基金项目:2009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“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”(09JZDW004),项目负责人:罗福惠;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:“民族危机与政治动员: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研究”(12YBB182),项目负责人:郭辉。

岁”等口号^[3]。国民政府中枢纪念会，民国要人都会参与，并行升旗、“恭读总理遗嘱”、向“党、国旗鞠躬”等礼仪^[4]。

与战前不同的是，抗战期间的“双十节”纪念活动，更有对内凝聚民心、进行民族救亡，对外联合盟邦反法西斯的用意。

对于民众，“双十节”是国民政府凝聚民心，进行民众动员，增加抗战力量的重要方式。1937年“双十节”中枢纪念会，林森在演讲中即号召为抗战将士募集慰劳金及伤病难民棉衣，动员全民为抗战效力^[5]。同时，浙江、陕西等省党部通电各界，开展扩大劝募棉衣、劝购救国公债运动^[6]。到抗战相持阶段后，国民党提倡国防科学运动，并于“双十节”中予以凸显。1942年“双十节”，为扩大国防科学运动，宣传部贴出“加紧科学建设，充实国防力量”、“提倡科学要发挥组织的效能”、“提倡科学要发挥分工合作的功能”等标语，对民众进行动员^[7]。1944年抗战即将结束，为动员广大青年参军，政治部于“双十节”编印特刊，由该部和渝市所属政工单位，用宣传列车绕本市宣传。在该列车中，除有播音、展览和歌咏各项目外，并陈列各战场的胜利品、宣传漫画、标语等。同时，为增加效果，还有军中实验剧团，在较场口广场公演话剧《黎明之前》。除此，还邀请民艺剧团表演大鼓、相声、魔术等民间艺术^[8]。国庆节中这些节目的加入，一方面增加了节日的氛围，一方面吸引更多的观众前来观看，在不知不觉中，将知识青年从军的号召灌输给民众。

除直接动员外，国民政府国庆不忘国难，寓“救亡”于联欢、游艺等节目之中。1937年“双十节”，湖北省党部在省党部大礼堂举行“化悲歌咏大会”，观者达千余人。参加表演者除“集体演唱救亡歌曲外”，还化妆对歌曲中之情节进行表演。这种节目形式，受到各界一致好评^[9]。1942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实验剧团及中央青年剧社，为庆祝“双十节”，特于10日晚在广播大厅与实验剧院公演《荣誉军人》^[10]。

放映爱国电影也是激发民族主义、凝聚民心的重要方式。1940年“双十节”，国民政府政治部电影放映队、中央电影摄影场、中国制片厂特地于国庆期间放映爱国电影^[11]。1941年10月10日晚，政治部放映队在重庆市中心区放映《获得洗礼》、《湘北大捷》等爱国影片^[12]。

此外，政府在广播节目中也凸显救亡意象。1942年“双十节”，中央国际广播电台播放话剧“自由万岁”^[13]。1943年“双十节”，排有女童唱《华夏英雄》与混声合唱《重庆双十》等节目。该台在“时事述评”中播讲《今年的双十节》，对“此历史上伟大之一日，寄予无限之热望”^[14]。

国民政府“双十节”的阅兵，也成为鼓舞士气、激励抗日斗志的重要方式。1939年国庆前，国军取得湘赣大捷，军民欢欣鼓舞。基于此，国民政府于此年“双十节”进行阅兵，以鼓舞民族士气。晨8时，蒋介石在重庆检阅军队，其夫人宋美龄陪同，川康军政首长邓锡侯、贺国光、刘文辉、王缙绪及外宾多人观看阅兵^[4]。本次阅兵，仪式甚为简单，媒体报道不见细节。但其所要表达的意义，正如蒋在接下来的训词中所言：希望军民把握时机，矢志于报国革命之神圣任务^[15]。

国民政府还通过国庆授勋来激励国内抗战有功的将领，如1943年“双十节”，国民政府授勋于抗战名将，不属于蒋介石嫡系的白崇禧、阎锡山、李宗仁等也名列其中，显然意在激发民族斗志和抗战精神^[16]。

说到国庆授勋，国民政府还曾以此手段联络友邦，争取外援。抗战初期，中国孤军奋战，盟邦、外援都很少，1937年“双十节”授勋名单中，德国人占大多数^[17]。彼时德国尚未与日本结盟，英、美对日本侵华战争抱以绥靖、观望态度，德国在军事上对华有所援助，工业上签订多项协议，所以授勋以巩固这种难得邦谊。随着日德结成轴心国家与同盟国全面对抗，世界大战日益扩大，中国与英美关系逐渐拉近，国庆授勋的外国人转为同盟国人士。

为表现与同盟国共同抗击轴心国的意志，国民政府还通过驻外使领馆举办国庆招待会，如1940年“双十节”，中国驻英大使馆发起招待会，英朝野名人与各国外交家如阿特里、薛西尔、李滋罗斯、诺尔贝格、麦斯基等均到会。郭泰祺大使在会中做了重要演讲，马格里菲发表演说，提出“应

以最大力度支持中国最后胜利”^[18]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盟邦关系日益紧密，中国地位更加重要。对此，盟邦为表示与中国关系，开始主动积极参与庆祝中国“双十节”。1942年10月10日晨7时45分，费城为庆祝中华民国诞生31周年，在独立厅特鸣自由钟31响。后由美最高法院推事陶格拉斯发表演说，他表示“自由钟非仅古迹而已，此乃吾人自暴政获得自由与不惜任何代价保持此自由之象征，此乃团结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之象征，此乃彼辈希望他日仍能享受自由者之警钟，使其明了今日必须不惜生命，以维护其自由。”“此一时刻，为中华民族诞生三十一周年之黎明。”中国在庆祝其“双十节”时，并未沦为附庸，仍为一独立奋战之国家。当年“双十节”，更见中美合作，打击“自由民族之公敌”。“吾人今日鸣钟以庆祝中国国庆，并愿与中国同胞共同宣言，自由之人类必将继续自由独立，吾人将团结一致，使自由遍漫全球”^[19]。对此，《中央日报》发表社论，指出美国人民为友邦在国庆日鸣自由钟，这是“破天荒”的“第一次”。美国自由钟声响彻全球，“打动了我们以及全世界爱好自由，正义与和平的人们的心弦”^[20]。

同日，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于其寓所，招待美、英、苏及其他联合国海陆军高级军官，一起庆祝“双十节”。美国总统参谋长李海、全美舰队总司令金氏、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安诺德等均赴宴。是日晚，在纽约卡耐基大厅，中美三千余人共同纪念中国“双十节”，并举行联合援华大会。大会由美国援华委员会主席麦克菲主持。主席台后悬挂有联合国三十余国国旗，大会开始后，遂有人将中美两国国旗，移至主席台上。“参加大会群众由乐队及歌咏队领导，合唱中美国歌”。会中，主席宣读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来电，电文希望“中美两国能团结战胜强敌，并团结重建世界。”同时，美国驻日大使格鲁、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均发表演说。其中格鲁希望中美能够“共同建设未来的世界”^[21]。

到1943年，中美英关系更加紧密。伦敦为庆祝“双十节”，特举办援华音乐会，并由英国广播公司向全世界播放^[22]。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与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，于圣保罗大教堂“领导到会群众向中国伟大抗战遥致敬意”。魏道明于会中宣读林森故主席遗嘱，以示中国抗战精神。教堂内高悬中国国旗，会众在会中高唱中国国歌^[23]。

“双十节”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、民主共和、民族独立的标志，凝聚着民族主义意象，抗战时期对“双十节”的庆祝，有鼓励民气、激发民族斗志的民族主义面相；抗战时期又是联合国家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时期，作为同盟国，它们与中国共同纪念“双十节”，使民族性的面相与“以建大同”的世界主义面相融为一体。

二、对“辛亥精神”的阐释及其与“革命精神”的连接

除了纪念活动外，国民政府通过文牍、刊物等传播媒介，对辛亥革命进行阐释。在其阐释内容上，与以往有延续，有发展。

对于辛亥革命的领导者，国民党延续以往，把辛亥革命、建国与孙中山、国民党连接起来，指出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以先知先觉之资，“怀救国救民之愿”，领导志士进行革命，最终推翻满清，建立民国^[24]。

到抗战时期，贫弱中国与强大日本的斗争需要一种坚强的精神和意志，使国民政府更加注重对辛亥革命精神进行强调与阐释。

例如，对孙中山所讲述的熊秉坤打响第一枪的事件，在抗战时期不断被重述。1938年“双十节”中枢纪念典礼，林森在讲话中就讲述到：从前总理告诉我们，武昌起义时，作为新军排长的熊秉坤，看到本党花名册被瑞澂搜去后，知道事情紧迫，联络革命同志，想要发难。由于没有子弹，熊向退伍朋友借两盒子弹分给革命同志，发起武昌起义，攻破武昌。林森说总理很重视熊秉坤身上体现的辛亥革命精神，认为“这不是子弹的力量，乃是革命精神的感召”^[25]，并多次表示，打破武昌者，“革命党人之精神为之”^[26]。

国民政府以“辛亥精神”接引当下，将“辛亥精神”与“抗战精神”连接起来，以为抗战服务。王宠惠在1942年“双十节”总结辛亥革命教训时，这样论述辛亥革命精神，“辛亥革命之胜利，证明精神之伟力。辛亥之时，本党无武力，无财力，而除手枪炸弹以外，亦无所谓武器，即军民首义，实力与清军相较，何啻天渊。然本党能以弱胜强，以寡克众者，所恃惟总理之精神，惟革命之精神而已。当总理海外归来之时，中外人士有说其携款若干者，总理但云所带回者，革命之精神而已。此种精神，即精诚无间百折不回之精神，即不成功便成仁之精神，即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之精神。此革命精神，即民国开国之精神，亦即今日总裁领导抗战之精神”^[27]。

从王这段对“辛亥精神”的论述来看，“辛亥精神”有三层意思：第一，“辛亥精神”指孙中山不断为革命奋斗的革命精神，即“总理奋斗精神”；第二，“辛亥精神”指国民党先烈开国之革命精神，即“党人革命精神”；第三，“辛亥精神”指当前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全面抗战的“抗战精神”，这是“辛亥精神”的时代化。

“辛亥精神”因时而异，因当下需求而被不断加以充实。在抗战时期，“辛亥精神”在国民党人叙述中的另一个面相，就是“抗战精神”。国民革命的目的是为建国，辛亥革命先烈发动革命是为建国，抗战也是为建国，“抗战即革命”。故就精神层面上讲，“辛亥精神”与“抗战精神”有同样的目的和作用。处于抗战时期，只有“拼全民族的生命，求国家的生存”，而“唯有牺牲的决心”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，此种决心，“即吾抗战之精神也”^[28]。此种精神，是中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的精神保障，也是中国人民“团结卫国、奋发图强、自力更生之新精神”^[29]。

为此，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国民党的领袖，他为革命奋斗的传统，自然成为“辛亥精神”叙述的源头。国民政府特别强调孙的革命精神。林森在1938年“双十节”讲话中指出，目前抗战时期，在心理上“要继续发挥总理的革命精神”。在武昌首义以前，总理经历过多少次失败，然而他从不气馁，失败一次，革命的决心“坚定一次”。因此，到武昌首义，便一举成功^[30]。在1939年“双十节”讲话中，林森再次强调，“我们要发扬总理的革命精神”，并以此作为继承孙中山遗志完成使命的重要任务之一^[31]。

“辛亥精神”除了“总理精神”这一源头，还需要执政的国民党的“党人精神”，在国民政府看来，这是以党为核心凝聚抗战意识所必需的。所以在国民政府的诠释中，“辛亥精神”是国民党先烈的革命精神，而非其他人群的精神。1941年孙科在“双十节”纪念中指出，我们要继承武昌起义时革命党人推翻帝制、建立民国的革命精神，实现抗战建国^[32]。何应钦在1942年“双十节”表示，在抗战今日，应追怀革命先烈创造民国之精神和其奋斗之忠勇事迹，我国家民族之万事不拔之基，也由此而奠立^[33]。张群在1939年“双十节”文章中指出，辛亥革命精神的基础，是建筑在“共同的信仰之上”，这个信仰就是三民主义^[26]。张又在1940年“双十节”纪念文章中言：“革命精神者，即为我革命同志同具之精神”。他对“辛亥精神”的因素予以分析，认为“辛亥精神”应具备三个因素：第一为“革命之主义”，即三民主义；第二为“革命之目的”，即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；第三为“革命之信念”，即“总理之信念”，即坚信“共和革命”为世界潮流也。张指出有“崇高之主义，明确之目标，坚定之信念，而后有辛亥革命之成功”^[34]，而这些也正是抗战胜利的保证。

三、“革命尚未成功”说的凸显及“孙—蒋”连接

孙中山去世后，国民党逐渐神化孙，使其成为“国父”。“双十节”纪念中加入“恭读总理遗嘱”、“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”等仪式，他留下的主义、遗嘱也成为万世不易之真理。到抗战时期，国民政府在“双十节”纪念中，仍延续这一传统，继续神化孙中山。如1939年国庆纪念宣传大纲中，国民政府就表示三民主义是“救国的主义”，总理遗教和施行政策须“坚决的完全的接受”。^[35]潘公展在1940年“双十节”中说道，国民革命的最高原则即是国父孙中山所创的三民主义，它不仅是抗战的最高原则，也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，争取独立自由应走的“唯一大道”^[36]。

辛亥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，这样的建国理想一直未能实现。孙中山去世后，他留下的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”遗言被国民党反复征引，以作勉励之用。但另一方面，“革命尚未成功”说也成为国民党及其领袖进行标榜自身合法性的重要话语。抗战时期“双十节”纪念中，国民党就凸显“革命尚未成功”说，在勉励国人的同时，来为自己合法性张目。

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专制统治，但三民主义革命的任务并未完成。抗战爆发后，民族危机空前。因此，林森在1938年“双十节”讲话中就强调，在纪念“双十节”的同时，要努力完成“我们的使命”，即实现三民主义和完成国民革命。这也是总理与辛亥革命先烈留给我们的“未竟之业”。实现三民主义是辛亥革命的目的，国民革命是实现三民主义的手段^[37]。

要完成革命，须民族、民权、民生三民并举，而抗战时期国民党凸显的是民族主义。在“双十节”纪念中，国民党对孙的民族主义做出进一步解释。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并非狭隘的中国民族独立，更有世界和平、安定的涵义。蒋介石在“双十节”《告同胞书》中表示，孙中山毕生倡导革命，目的是要“以建民国，以进大同”。孙在“民族主义”演讲中明确表示，“我们不但要恢复民族的地位，还要对世界负一个大责任”，这个大责任就是要使世界形成一个大同之治^[38]。

照这样来看，革命远未成功，孙中山的“志业”（革命），“我们的使命”，还没有完成^[30]。在国民党的表述里，暗示自己才是孙中山的正传，孙的未竟之业也只有国民党才能完成。

“革命尚未成功”，国民政府把抗战诠释为国民革命的一部分。蒋介石表示，根据孙中山遗教，国民革命分为两个阶段：第一阶段任务，在完成国内的统一；第二阶段任务，在完成民族的独立。而现在抗日就是为实现民族独立^[39]。陈诚在1938年“双十节”纪念文章中指出，孙中山倡导革命50余年，第一步是推翻满清专制统治，这是在孙中山领导下完成的；第二步是铲除军阀，肃清封建势力，这是“领袖秉承总理的遗志”完成的；抗战是国民革命的第三步，这次工作的使命便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实现国家的独立自由平等。这也是孙中山和“革命先烈的遗业”^[40]。从革命阶段上来看，革命也未成功。

辛亥革命之目标，也是今日抗战之目标。“而今吾人之大敌，亦即当时之大敌”^[27]。因此，在抗战时期，就要努力完成建设，以实现主义。王宠惠表示要“以驱逐日寇贯彻民族主义”，“以政治建设完成民权主义”，“以经济建设实现民生主义”。只有三个主义同时并举，才能达成“真正自由平等之目的”。^[41]蒋介石也表示，“抗战即革命”，要使抗战胜利与革命完成“毕其功于一役”^[42]。

在“革命尚未成功”说凸显的同时，国民政府也努力建构革命谱系，把孙一蒋连接起来，把神化孙中山发展为神化蒋介石，建构蒋介石的集权统治，使其个人崇拜合理化。

王觉源在1939年“双十节”纪念文章中就称：“孙中山先生创造民国，蒋委员长复兴中国，故蒋委员长为孙先生之唯一继承者。”如果说“孙先生为三民主义的创造者，则蒋委员长便是三民主义的实行家。”^[43]王宠惠也于是年以同样的方式强调：“二十八年先在先总理的领导之下，为创建中华民国而奋斗；目前在总裁领导之下，为保卫我们二十八年前所创建之中华民国而奋斗”，两者时间虽殊，“情形虽异”，但同为国民革命之一部分。辛亥革命是为实现三民主义，抗战也是为实现三民主义^[44]。

与强调当下和把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唯一继承者相比，国民政府还将蒋介石的“革命”事迹向前推进。如1940年《中央日报》社论就如是叙述。该文对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、与北洋军阀斗争和建立广州革命根据地做一叙述，而革命还未竟全功孙就“不幸”中道而逝。幸而“天佑中华”，“总裁亲承总理遗泽”，创办黄埔军校，“继而提师北伐”，完成统一，定都南京。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，国民政府结束军政，实施训政^[45]。

吴稚晖在强调蒋介石承继孙中山衣钵的同时，更以美国华盛顿、林肯相喻。吴言道，华盛顿在美国“演出了七月四日的新国庆”，他的继承者林肯则实现了美国人的自由平等。而在中国，孙中山通过四十年的努力，造成了中华民国的“新国庆”，其意义与华盛顿朝晖相映。希望世界爱好和平自

由的人,“能帮助我们中山先生的继承人蒋介石先生”成为第二个林肯^[46]。

国民党主席林森去世后,蒋介石于1943年“双十节”就任国民党主席,蒋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,在权力和威望上也达到巅峰。是日的《中央日报》社论以历史的“必然逻辑”来建构革命谱系。社论认为孙一蒋连接是“中国近五十年史的必然逻辑”:有了孙中山创造的三民主义,“才有中华民国的肇造。有了中华民国的肇造,才有总裁继承国父遗志,领导北伐大业的成功,摧毁军阀割据之局”,才使中华民国能统一于“革命的国民政府之下”。“全国同胞真是万幸,先有国父,后有总裁这样崇高伟大的领袖,始能建民国,御外侮。”^[47]孙中山之功,在于领导辛亥革命,肇建民国。蒋介石之功,在于承袭遗志,“提师北伐”,“达成第一期革命任务”,而抗战建国的第二期任务还须在蒋介石领导之下进行^[48]。

抗战时期孙一蒋的连接,是国民政府对权力谱系的重构,也是蒋介石权力和地位提高的表现。但另一方面,国民党强调“一个政党”、“一个领袖”、“一个主义”的法西斯民族主义主张,也是其试图建立集权统治的重要表现。

在国民政府的表述里,它是辛亥先烈遗业的继承者。正如1937年《中央日报》社论所表述,26年来,“本党一直从事建国工作”,全国人民在国民党领导下,“一心一德”,已形成“牢不可破的整体”。^[49]在抗战时期,全国党政军民,要本着“国家至上,民族至上”、“军事第一,胜利第一”、“意志集中,力量集中”的共同目标,携手抗战建国^[50]。

国民政府所言“一心一德”和上面的“共同目标”,就是要为国民政府集权统治提供依据、寻找借口。王宠惠在1939年“双十节”纪念文章中表示,如今已不同于28年前,三民主义已“深入人心”,全国在“一个政府、一个主义、一个领袖的领导之下”,“一心一德”为抗战建国奋斗^[44]。王觉源也指出,十年来各种党派集团思想的斗争显示,一个现代国家,“只能有一个政党、一个领袖、一个主义、一个政府”作为重心,来肩负历史重务;只有三民主义思想方法,最适合中国环境;只有坚持“国家至上,民族至上”现代国家原则,才能在蒋委员长的带领下,取得抗战建国的胜利^[43]。这样,在国民政府的论证里,中国实行“三个一”已成为历史的趋势。

在“双十节”纪念中,国民政府要人经常用“三个一”的主张来进行动员。如何应钦在1941年“双十节”纪念文章中就希望全国军民,在“一个主义、一个政府、一个领袖领导之下”,发扬辛亥革命精神,抗战到底,共同完成国民革命的伟大使命^[51]。

“一个政府、一个主义、一个领袖”的提法,是国民政府进行集权,排挤其他政治势力的重要借口。“一个政府”是国民政府;“一个主义”是三民主义;“一个领袖”是蒋介石。这“三个一”都凸显了国民政府抗战不忘集权的特质。

综上所述,南京国民政府抗战救亡时期的“双十节”纪念,在延续战前凸显“党国”符号的同时,也有一些新变化。在纪念活动中,国民政府不仅对内凸显救亡意象,彰显民族主义,进行凝聚民心、调动民力的动员,对外也与盟国共庆,将“双十节”的民族主义意象与“以建大同”的世界主义意象融为一体。在“双十节”的叙事中,国民政府延续战前纪念中对革命领袖孙中山及国民党先烈的颂扬,对“辛亥精神”进行阐释,赋予其新意,并将辛亥革命精神发展为“抗战精神”。另一方面,国民政府抗战不忘集权,藉继续神化孙中山,和凸显他的“革命尚未成功”说,将孙一蒋连接,推衍出孙中山正统继承人蒋介石独揽大权的合法性。通过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“双十节”纪念,也可以观察到政治节日、辛亥革命资源政治运用的多面性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何卓恩,周游.“共和”与“革命”:民初“双十节”阐释之演变[J]. 社会科学研究,2011(1):155-160.
- [2] 周游.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“双十节”纪念[J].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:社会科学版,2011(5):27-28.
- [3] 今日国庆纪念首都全市升旗志庆[N]. 中央日报,1937-10-10:第1张第4版.
- [4] 万民鼓舞渤海欢腾纪念国庆祝贺大捷[N]. 中央日报,1939-10-11(2).

- [5] 国府纪念会林主席报告[N]. 中央日报,1937-10-11(2).
- [6] 各地昨动员推行三运动[N]. 中央日报,1937-10-11(2).
- [7] 国防科学运动标语[N]. 中央日报,1942-10-10(3).
- [8] 政治部今起扩大宣传知识青年从军[N]. 中央日报,1944-10-10(3).
- [9] 昨日国庆纪念武汉各界热烈庆祝[N]. 大公报(汉口版),1937-10-11;第1张第4版.
- [10] 全国悬旗庆祝[N]. 新华日报,1942-10-10(2).
- [11] 陪都各界热烈庆祝国庆[N]. 中央日报,1940-10-10(3).
- [12] 双十国庆三十周年陪都今热烈庆祝[N]. 新华日报,1941-10-10(2).
- [13] 国庆广播节目排定[N]. 中央日报,1942-10-9(3).
- [14] 国庆广播[N]. 大公报(重庆版),1943-10-9;第1张第3版.
- [15] 重庆市万民欢腾国庆日庆祝大捷[N]. 新华日报,1939-10-12(2).
- [16] 全国文武官员国府明令授勋[N]. 新华日报,1943-10-10(2).
- [17] 国府授勋令[N]. 大公报(汉口),1937-10-11;第1张第2版.
- [18] 双十节伦敦盛会[N]. 中央日报,1940-10-15(2).
- [19] 美贺我国庆[N]. 大公报(重庆),1942-10-11;第1张第2版.
- [20] 社论:《响彻全球的自由钟声》[N]. 中央日报,1942-10-13(2).
- [21] 庆祝我国国庆纽约举行援华大会[N]. 熊式辉欢宴盟国军事要员. 大公报(重庆版),1942-10-12;第1张第2版;认真的作战认真的胜利. 中央日报,1942-10-13(2).
- [22] 英国各地庆祝我国庆[N]. 新华日报,1943-10-11(2).
- [23] 庆祝双庆踊跃献机[N]. 海内外情况热烈. 中央日报,1943-10-13(2).
- [24] 今日国庆纪念[N]. 中央日报,1937-10-10;第1张第4版.
- [25] 中枢昨隆重举行国庆纪念典礼[N]. 中央日报,1938-10-11(2).
- [26] 张群. 论辛亥革命精神[N]. 中央日报,1939-10-10(3).
- [27] 王宠惠. 辛亥革命之教训[N]. 中央日报,1942-10-09(2).
- [28] 中央发表告同胞书[N]. 中央日报,1938-10-10(2).
- [29] 中国之御侮与更生——国庆日孔院长对外发表感言[N]. 中央日报,1938-10-11(3).
- [30] 纪念国庆要完成我们的使命——林主席广播演讲(续)[N]. 中央日报,1938-10-13(3).
- [31] 中枢昨晨纪念会林主席五点训勉[N]. 中央日报,1939-10-11(2).
- [32] 孙科. 要以坚持抗战国策来纪念国庆——为国民三十年国庆纪念日作[N]. 中央日报,1941-10-10(8).
- [33] 何应钦. 加强自力更生增进合力奋斗——国庆纪念献词[N]. 中央日报,1942-10-10(2).
- [34] 张群. 辛亥革命与革命精神[N]. 中央日报,1940-10-10(5).
- [35] 国庆日宣传大纲[N]. 中央日报,1939-10-10(4).
- [36] 潘公展. 庆祝国庆与外交形势[N]. 中央日报,1940-10-10(5).
- [37] 努力完成我们的使命——林主席国庆日广播演词[N]. 大公报(汉口版),1938-10-12;第1张第3版.
- [38] 二十七年国庆纪念蒋委员长告国民书[N]. 中央日报,1938-10-10(2).
- [39] 蒋委员长广播演词[N]. 中央日报,1937-10-10;第1张第2版.
- [40] 陈诚. 最后胜利的关键——民国二十七年双十节感言[N]. 大公报(汉口版),1938-10-10;第1张第3版.
- [41] 王宠惠. 实现主义完成建设[N]. 中央日报,1943-10-10(11).
- [42] 社论:《三十三年国庆感言》[N]. 中央日报,1944-10-10(2).
- [43] 王觉源. 奋斗和教训[N]. 中央日报,1939-10-17(4).
- [44] 王宠惠. 抗战与双十节[N]. 中央日报,1939-10-10(2).
- [45] 社论:《抗战建国之革命的意义》[N]. 中央日报,1940-10-10(2).
- [46] 吴稚晖广播演说[N]. 中央日报,1941-10-12(3).
- [47] 社论:《双十双庆献辞》[N]. 中央日报,1943-10-10(2).
- [48] 陪都双庆盛况[N]. 新华日报,1943-10-11(2).
- [49] 社论:《今年的国庆纪念》[N]. 中央日报,1937-10-10;第1张第2版.
- [50] 陈长衡. 民国二十八年双十节感言[N]. 中央周刊;第21、22期合刊,1939-10-10;99.
- [51] 何应钦. 发扬辛亥革命精神争取抗战最后胜利——双十节献辞[N]. 中央日报,1941-10-10(3).